

# 伏季休渔又一年,“鱼满仓”何时才能“昨日重现”? 渔民和执法者的共同心声:让法网比渔网更密

■ 本报记者 王索妮 文/摄

5月的最后一天,烈日照射下,象山石浦渔港泛着闪闪金光,东海海水泛起的鱼腥味伴着潮起潮落从四面八方涌上岸,这种让外来者皱眉掩鼻的味道对本地渔民来说,却有着一种让人心安的魔力。

然而近几年,石浦渔民却难有心安的感受。东海如今渔业资源逐年减少,“东海渔仓”陷入无鱼窘境,这对于一直靠海吃海的石浦渔民而言确是痛点。

办法不是没有想过。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象山渔民为了保护渔业资源就提出了“休渔”的概念,即每年在规定时间内,禁止任何人在规定的海域内捕鱼。1979年,浙江省率先实施伏季休渔制度;1995年,这项举措正式上升为全国性的渔业资源保护制度。但几十载努力仍未扭转东海的无鱼困境,这也让渔民们开始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 风口浪尖下的执法者

6月1日上午,石浦港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印有“象渔供”标识的船舶密密麻麻地挤在码头。当天12时起,东海再次全面迎来一年一度的伏季休渔期。

在渔政码头,象山县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张生荣一刻也不敢松懈。接下来三个半月的休渔期对他而言又是一场硬仗,一艘“三无”渔船,某位远方亲戚,甚至是一张不起眼的渔网,都有可能成为他的对手。

整个渔业执法环境如今依旧恶劣,这在张生荣看来,绝不是危言耸听。

在石浦蒲湾违规渔船扣船所内,二十多艘价值百万的崭新渔船十分惹眼,然而这些都是“三无”船舶,即无船名号、无渔业船舶证书、无船舶籍港。

2014年5月28日,浙江渔场修复振兴暨“一打三整治”专项行动正式启动,这被张生荣看成是“渔政执法的春天来了”。经过两年的努力,张生荣和队员们顶住压力,取缔“三无”船舶1630艘。但这个风光的数字却并未让他轻松:那些从事渔业生产却违规操作的亲戚朋友在私下向张生荣“开后

门”无果后,并不会对他的铁面无私表示理解;而那些不满执法的“三无”渔船船主则经常将张生荣的办公室围得水泄不通,甚至报出他家住址,威胁他“自己当心点”。

这还不是最残酷的现实。对张生荣而言,最大的打击是,在浙江轰轰烈烈地打击“三无”船舶时,外地“三无”渔船依旧我行我素,更有甚者跑到福建、江苏造船,再回到浙江使用,如此一来,“三无”船舶始终存在回潮和反弹的情况,他和队员们所有努力随时会功亏一篑。

除了“三无”渔船,张生荣还要面对大量违规的渔具。根据国家农业部的规定,我国已全面实施海洋捕捞网具最小网目尺寸,以拖网为例,渔网的最小网目为5.4厘米。而目前来看,很多渔网的最小网距在1-2厘米。这些网被称为“绝户网”,可以说只要是执法人员上船检查,几乎是“一查一个准”。

无论是打击取缔涉渔“三无”船舶,还是清理整治“船证不符”渔船和禁用渔具,这些执法行为本该涉及渔业、经信、市场监管、公安边防等诸多部门,需要全省乃至临省的相关部门联合发力,但令张生荣遗憾的是,目前联动执法协作机制依旧薄弱。

## 法网不及渔网密

浙江的渔民流传着这样一则谚语:今天不吃子孙鱼,明天子孙有鱼吃。

年过六旬的石浦人黄根宝15岁起出海打渔,直到两年前才“上岸”。如今虽远离风浪,但每次吃鱼时,他都不禁自问:当年捕鱼的方式是不是太狠了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海渔场还是一片物产丰富的景象,整个象山县也只拥有一百多条渔船。那会



儿,只要航行一个多小时,渔民就能捕到各种鱼:鲳鱼、带鱼、墨鱼、大黄鱼……现在一口气念出这些鱼的名字,黄根宝依旧会眉飞色舞。他说,对于渔民来说,最开心的事始终是满载而归。

上世纪90年代伊始,浙江兴起造现代钢制渔船的热潮,石浦的渔船越来越多,鱼的品种和数量开始急剧减少。现在本该是吃大黄鱼的最好季节,但身为渔民的黄根宝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已有近二十年未见到过野生大黄鱼了。

出海的日子太过清苦,黄根宝说,如果可以选择,没有人愿意当渔民。如今,黄家8个兄弟姐妹的“渔二代”们鲜少再回海里捕鱼,黄根宝的儿子也在宁波市区找到了一份和渔业毫无关联的工作。

这不是个案。有着“浙江渔业第一村”的东门渔村至今保持着“零农民、全渔民”的记录,连村里的“一把手”也全是渔民出身。但当你踏足这里时不难发现,古旧的房屋随着主人的搬离在时光的打磨下变得破败,为数不多的新建楼房内,也只剩下劳累了半辈子的渔民老夫妻。村委会主任周全球坦言,渔业资源匮乏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岛进城,渔文化的传承也面临后继无人的处境。

其实,渔业资源越来越少,没有人会比渔民这个群体更痛心。无论问到哪位渔民,他们均表现出了对“绝户网”的痛恨,但现实中,他们却又不得不和“绝户网”为伍,而即便使用“绝户网”出海,他们也不一定能盈利。在渔船码头,船老大王师傅带着“绝户网”归来,出海10天需要满载3000箱海鱼才能保本,而他只带回了2000箱。

没有公平健康的环境,恶性循环永不会终止,这两年,守法的渔民要求重“法”的呼声不绝。

张生荣说,尽管我国刑法专门规定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但绝大多数非法捕捞者只是被处以行政处罚,受到刑法追责的少之又少,“只有通过法律增加违法成本,特别是让那些多次违法、屡教不改者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才能真正改善海洋生态环境”。



张生荣和队员们上船检查



2.2厘米网目的渔网在渔船上非常普遍

# 温州股民徐财源举报深交所涉嫌渎职 曾起诉证监会不作为、乱作为

■ 《北京青年报》齐雁冰

温州股民徐财源5月31日向记者透露,深交所及其工作人员涉嫌在监管深市上市公司凯迪生态上存在渎职等违法犯罪行为,举报信已经快递至深圳检察院。徐财源曾成功组织投资者向钢钒权证、ST南方、金宇集团维权,今年一季度更是一纸行政诉状直指中国证监会,诉其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

## 凯迪生态多次被深交所问询

凯迪生态1999年在深交所上市,主营绿色能源业务、环保发电、原煤销售。2015年年报显示,公司2015年实现净利润3.88亿元,增长率超过四成。

经营数据虽不难看,但其年报披露的业绩数据与盈利预测数据出现重大差异,被业内人士认为数据难以自圆其说,内控存在重大缺陷。一直关注凯迪生态的湖北德馨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陆峰认为,凯迪生态近年资本运作涉及面广、资金量大,从2012年以来已多次收到深交所的监管问询函,说明公司信息披露及内控存在诸多问题。

2016年3月3日,凯迪生态发布《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的公告》,公司最近5年分别收到7次深交所监管函、4次深交所关注函、9次深交所问询函(加最近的2次共11次)。徐财源认为,这其中深交所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表现在:一是深交所对凯迪生态依法应予处罚的违法行为以监管代替;二是深交所没有督促凯迪生态依法公告监管函、关注函、问询函;三是深交所对凯迪生态未依法公告监管函的行为未予处罚。

徐财源昨天对记者表示,举报信已经通过快递递至深圳检察院,内含附件7份及身份证复印件1份。徐财源同时通过认证微博披露了举报信内容。

## 深交所被举报“问而不罚”

在举报信中,徐财源同时举报深交所涉嫌渎职犯罪的行政不作为。举报信表示,面对凯迪生态涉嫌违法违规事实,深交所迫于他和其他股民向中国证监会的举报,虽下达了监管函、关注函和问询函等,但目的是规避自己的监管失职:凯迪生态部分违法犯罪事实虽已得到确认,却既不直接处罚,也不提请证监会行使处罚权,这是明显的渎职犯罪和行政不作为。

据了解,徐财源近年多次实名举报凯迪生态,2013年曾举报凯迪生态大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和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损害国家和股民利益。今年5月,徐财源向中国证监会举报凯迪生态业绩造假,同时举报深交所、湖北证监局未对凯迪生态依法行使监管职责的渎职行为。徐财源认为,凯迪生态在业绩披露方面直接违反了深交所的相关规定,2015年10月27日的虚假预增公告是为配合收购大股东资产而召开股东大会,且类似问题比比皆是。

在最新的举报信中,徐财源表示,深交所对凯迪生态的年报问询函“问而不罚”,凯迪生态回复公告自相矛盾、漏洞百出,深交所未依法对其处罚的行为涉嫌渎职犯罪。根据2015年6月20日凯迪生态发布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资产交割的公告》,凯迪生态实际控制人通过一系列运作,把大股东的垃圾资产以

685023.84万元卖给凯迪生态,业绩达不到预期,其高管大部分放弃高薪辞职,有的正移民海外,已给国家和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深交所作为证券市场的监管者和执法者,其渎职和不作为使凯迪生态的骗局得以成功,应对凯迪生态给国家和投资者造成的重大损失负责。

## 徐财源曾起诉证监会“乱作为”

公开资料显示,徐财源生于197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1998年成为职业股民,曾入围“温州年度经济人物”。2008年11月,徐财源为钢钒权证的投资者成功维权,创造了股民面对国上市公司成功维权的第一案例。之后徐财源组织了对ST南方、海南航空、中元华电、金宇集团等的维权行动,有媒体评论其为“被监管层和上市公司避之唯恐不及的人”。

今年1月14日,徐财源将一纸诉状递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直指中国证监会,诉其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徐财源在起诉状中表示,作为证券期货市场监管部门,证监会的职能是致力于维护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然而“由于被告的渎职和不作为,甚至是乱作为,多项措施没有全面考虑,部分领导和工作人员涉嫌犯罪,造成中国股市暴跌,让包括原告在内的中小股民遭受重大损失,构成了行政违法”。

一个月后,二中院以没有管辖权为由,对徐财源的起诉未予受理。徐财源随后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次是状告证监会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一中院认为,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证监会发布的[2015]21号公告是针对资本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性行为,未对特定对象设定具体的权利义务,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起诉人所提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徐财源继续上诉至北京高院。今年4月20日,北京高院宣布维持原审裁定。